

纸上留痕（下） ——涪州（武隆）乱世史家刘之益

◇ 杨永雄

五

著述已惊开竹素，挑灯无事话沧桑。他回故乡隐居后，埋头于地方史志之中，这位科举的多年失败者，矢志不移的抗清志士，终于找到了走向未来的最佳路径。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，收集、整理、抄录地方历史风物。正因他博学多才、书香世家、身世坎坷、扎根底层，所以他看到了时间之外的历史真相，那潜伏于平静的水面下的湍急细流，那隐藏在民间坊语的逸人趣事，那消失在旷野山间的文物古迹……他少年时多次游历过，比好些人都记得深刻，记得明白。

具有两千多年建置史的涪州，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，在明代以前没有独立州志，只散见于史册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涪州进士，官居户部员外郎的夏国孝曾纂修《涪州志》一部，早已散佚，今仅存序文一篇。清康熙之前所修的地方志书皆已散佚，对了解、研究地方史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，令人扼腕叹息。

一个经历了宦海风波、死里逃生的老人归隐故里，立志创修州志，这样的归宿在由文人出仕的官僚中并不鲜见。一般来说，到了这时候，当事人的火气已打磨得差不多了，修志与其说是一种造福桑梓的善举，不如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消遣，至多也不过是一种仕途不得意的解脱。但刘之益还没修炼到这般境界，他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。

作为具有文化情怀的文士刘之益，首倡纂修志书，得到少年同窗好友文珂和文友夏道硕的响应支持，纂修三人都是明朝遗老，皆为贡生入仕，书香世家，广博多才。文珂，字奚仲，曾任知县；夏道硕，字华仙，曾任大宁、大竹知县，升兵部武选司主事，工书，能文。张献忠所部攻陷涪州时，被捕获，断其右臂，血淋漓的伤口得到慢慢愈合，幸运苟活残命，不得不以左手书写。举人何先虞、赠文林郎陈命世、贡生向觴樾作为编辑。六人组成编辑小组，开始呕心沥血、披肝沥胆潜心著志。经过他们日夜操劳、奔波求证，才使得烟波浩瀚的涪州文化，成为我们今天回溯历史的遥远远方。

刘之益和几位修志者，尽管耗尽心血，费其家财，也属民间行为，个人爱好。旧朝规定，民间修志，未经官方允许，不得刊刻、面世，只能手抄传阅，手抄费时耗力，所以留下卷数有限，容易散佚。冯懋柱在《旧序》里说：“刘、夏、文纂修《涪志》，但集仅抄白，历吴、朱、萧、孟、杨、徐六郡侯未授梓。”你看看，一部志书历经六届州官都没有愿出资来刊刻、面世，多么让人心生凉意，如今无法设想几位遗老心里是什么滋味。

刊刻一本《涪州志》才要几个钱呢？我查找了一下康熙年间的物价指数，大约有二十至三十两银子足够了，相对于涪州府里那流水般的开销，相对于大款少爷们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磅礴气概，这个数字绝对只是一点毛毛雨。何况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呢？这些郡侯平时也常和文人一起喝

喝酒、赋赋诗，甚至在酬酢中称兄道弟。但附庸风雅是一回事，资助出版《涪州志》这样的赔钱不讨好的事，他们是绝对不干的。可怜“两江相汇，富甲巴蜀”的涪州，莫说金山银江、朱门豪宅、酒池肉林，却也是顿顿酒肉，夜夜笙歌，马来轿去是常有的，谁也不愿从手指缝里漏出少许来布施这点毛毛雨。一本志书的出版与否，干我何事？二三十两银子，还不如送给上司的门人做个见面礼，或倚红偎翠一回呢。

我在这里丝毫没有鄙薄郡侯的意思，相反，郡侯的到来恰恰维护了社会治安，推进社会进步，更激发了文士的激情万丈。州事赵廷桢来涪时，“访求旧志，犹得一册”，刘之益连夜抄录送去，后来连“旧册又为赵公携去”，一位文人的心血成果就随风飘失。又来了一位“郡父母朱麟禎欲为续修”，几位老人又苦熬了一段时间，草稿初就，云南又起兵事，再未果。郡侯走马灯似的又来一位萧星拱，在他的鼓动下，再次纂修终于完成，但萧知州还是吝啬不肯出钱刊刻。

这是文明的悲剧，那就只有让它凋零散佚了。

康熙二十二年（168年）冬月，纂修完《涪州志》上留下《序》中所述：“惜明烈宗甲申（崇祯十七年，1644年）后，旧版沦于劫焰。至我国朝庚子（顺治十七年，1660年），置州事赵公廷桢来抚吾涪，即访求旧志，犹得一册。益（刘之益）等仅抄录之以遗于后，而旧册又为赵公携去。幸康熙壬子（康熙十年，1671年），郡父母朱公麟禎欲为续修，草稿初就，会滇起兵，又未果。兹于述旧志外，参与天、崇时见闻确有据者，勉冀一日雅怀，亦吾涪承前待后之事也。”刘之益留下这段文字，其“抄录”并非是抄前人的旧志，而是自己和几人创修的手稿。充分证明了纂修一本地方志及其不易，几经波折，几易其稿。最后连底稿都没有了，只能靠传闻强记、存心如昔、遍征群野、觅诸石刻、考厥存迹，终成一书。

《序》还透露了刘之益潜心纂修郡志长达二十年，从赵廷桢来涪“抄写”旧志起，到康熙二十二年（1682年）刊刻、面世。他从三十多岁离乡，五十多岁开始创修志，到七十二岁草创刊刻，由青年而壮年而老年，人生由清晨到正午到黄昏，他余生的几乎全部岁月，只做一件事，只有一件事——修志。生活中的刘之益是寂寞的，文字里的刘之益却未曾寂寞。他和“三五老儿”，即文珂、夏道硕一起在历史中溯源的时候，也在与过去、未来对望、沟通、衔接。这本几万字的郡志，凝聚着刘之益等几位“遗老”一生的思考和心血，闪现了人生光华，使之成为一个时代的绝版，一次承前启后的壮举。哪怕在后来人看来，有些草率、有些误差、有些不全，但那是在完全没有蓝本下，靠传闻强记完成的。这本《涪州志》集州郡大集，包含广博，吞吐古今。后来，清康熙五十三年、乾隆五十年、道光二十五年、同治九年、光绪三十一年、民国十七年等六种方志都参照刘之益等人纂修旧志的成果。这几次

修志，武隆人都没有缺席，参与编辑、督刊、校对、采录者有刘衍均、彭宗舜、刘普、高伯楷、萧湘、沈国璋、王永绪、贺守淦等。

二十多年后，在康熙甲午五十三年（1714年）涪州知州（加五级）董维祺续修《重庆府涪州志》的《序》中说：“涪郡志久没于明季之灰烬。余于甲申岁（康熙四十三年，1704年）承乏兹土，下车问俗，访其人物山川，渺无所据。既而购一郡志稿本，阅之，乃昔郡中乡先生共成于前守萧公时也，历经二十余载。其间不无亥豕之虞，且多涂抹、讹舛陋衍，兼以蠹食之余，仅属残编断简，不辑而梓之，终归于尽。”《序》所称“乃昔郡中乡先生”，近些年，经涪陵地区地方志办公室整理，曾超先生校注时，“乡先生”指涪州刺史萧星拱编修《涪州志》时的涪州修志人员。即纂修刘之益、文珂、夏道硕，编辑何先虞、陈命世、向觴樾。到董维祺新续修时，刘之益已去世十一年，离他纂修成旧志已二十二年。旧志已属“残编断简”，在“遍征郡邑之书以备采择，而《涪志》尚为善本。”重修的《重庆府涪州志》正是依赖刘之益等人留下的“残编断简”进行增补、勘误、钩沉的基础上完成的。

耿直诚实的冯懋柱在《附序》里说：“其集中记载，凡系诸先生（刘、文、夏）所考定者，不敢妄易只字，止取传写之讹、涂注之误，校而正之，残缺者补之，新增者续之。”

六

刘之益纂修完《涪州志》已七十二岁，人已老、心未老。他从一位抗清复明斗士，回归到乡郡的文士，与当地“三五老儿”留史著志外，还为民生奔走呼号。

康熙二十年辛酉（1681年），他为重修州学写下一篇《重修州学碑记》，高度赞扬了州官重视教育的举动，必然会使这方“人文蔚起，弦诵风生”。这篇碑记后载入《涪州志·艺文》。

这时，刘之益年岁已高，却精神矍铄，心情极佳。儿子刘衍均比他幸运得多，二十一岁已中举入仕，先任成都华阳县教谕，继升成都府学教授，后任浙江德清县知县。衍均在成都任职期间，刘之益以八旬高龄重游成都，自少年考学，曾游过锦官城。那时是明朝，记忆清晰、思绪万千、感慨不已，如今耄年重游，清朝已统治了近半个世纪，见风景异于往昔，遂感慨明清两朝。他头年初冬去，到次年暮春回。他每日郊游，凭吊古迹，如武侯祠、少陵草堂、昭觉碑林，每留连吟咏，至暮乃返。

刘衍均因“吏治廉明，政先惠受”已升为成都府儒学教授，当年冬月二十六是他的生日，刘之益为儿子在扇子上写下一首勉励诗：

八旬千里一鞭驰，正值小坡初度时。

得地幸登天府国，景行已附帝王师。

欢承讲席成莱舞，训集鱣堂代鲤趋。

莫厌青氍惟苜蓿，忠君奚虑鼎烹迟。

刘之益在这首诗里不再沉吟悲伤明朝，而是勉励儿子，大意说：如今你幸运发迹在成都，要具备高尚品德和修养，可做辅助皇帝的股肱之臣，现在高兴地讲学又孝敬双亲，在讲学之所集训学生，莫要厌恶清寒贫困的生活，要向臣民一样忠君爱国。

漫漫冬夜，星斗闪烁，寒雾生凉，忧思无限。少年之时，胸怀大志，精忠报国，心怀黎民。两觐皇帝，两历生死，老年得子，纂志报梓，多少心愿，多少艰辛？一幕幕闪现。然而，天下之事，改朝换代，少年壮志，中年雄心，只能深深埋藏在心中。

刘之益晚年生活，变得简单、干净、从容，但还是喜欢郊游、饮酒、酬唱，除了自己写诗外，他还特别喜欢别人赠诗于他。《涪州志》《刘氏宗谱》记录了许多诗友赠给他的诗，如文珂、夏道硕、向子亮、向对扬、文景藩、陈俊、鲍秀伯、萧星拱等，赠诗之人并非等闲人物，皆是名流鸿儒。

曾任涪州刺史、升渝州太守萧星拱《赠四仙公》诗如下：

羡君积德有余光，耄耋期颐福寿昌。

清白源流敦孝弟，子孙繁衍继书香。

声闻海内艺兰秀，名播寰区桂萼芳。

忠厚相传绵且远，阅阅人家世泽长。

刘之益在八十岁时得到的这位江西进士，曾任凤翔县令，两任涪州知州，重庆知府，是涪州良牧，白鹤梁功臣的高度赞扬。萧星拱还为刘之益家题写了“达尊堂”“九世簪缨”堂匾和旧第对联。如今看来，刘之益作为地方寒士，能得到四品官员垂青，可谓非同寻常之人。

我认为在所有赠诗中，还是他同窗好友、同事文珂最洞悉他坎坷一生、奋斗一世的内心世界。诗云：

欲向南山写祝诗，耄耋不惯作支词。

记得儿童曾供塾，藏书深处君先知。

卿架千厢分甲乙，尺疏但与白云随。

青琐孤忠貽燕翼，神羊一綫缕缕丝。

君身一人承先后，生来不屑寄人篱。

北渡洞中持俎豆，夜月中流苏子期。

几番踢跖蜀江锦，峨眉山月隐潢池。

始终为明从六诏，神龙风雨恨未迟。

归来渐看凤毛长，笔诀诗词倾囊遗。

去年桂发为宁馨，春来又见八砖移。

棘闱已见忠魂护，学士青钱更何疑。

共看桃花映彩舞，蕉叶连绵竹醉

时。

够了，已经够了。读者看得很累了，诗友们赠他的诗完全可以出一本诗集，还不包括他自己著写的煌煌四卷《墨喜堂》。

在此，我不得不多说几句，不然对不起读者那么累读完这首冗长的诗。其实，文珂与刘之益“儿童曾供塾”，自然年岁相差不大，却在提笔写这首诗时，极尽铺陈之能事，好像作重要讲话前，要咳一下，表示吸引大家集中精神倾听，或者像一位上台比武之人展开拳脚架势，开笔就是“欲向南山写祝诗”，其实全诗充满了歌功颂德之辞。文人士大夫的晚年一般总是在怀旧中度过，也因此写出了不少好诗。这时候，一首怀旧诗也往往围绕着那个遥远而温馨的旧梦而生发：“始终为明从六诏，神龙风雨恨未迟。归来渐看凤毛长，笔诀诗词倾囊遗。”我认为全诗中这四句追求诗歌的思想深度和个性光彩，呈现了刘之益一生始终为明朝尽心去边远蛮荒之地为首领，尽管有神龙一般出神入化的本领，但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也难展现。如落水鸡一样归巢却没有失去光华，反而鸡身上生长出凤凰的漂亮羽毛，倾囊给人们是一部志书和不少诗词。这样的歌功颂德的“主旋律”再加上艺术技巧，自然赢得了被赠诗人的审美心志。

历史上多少鸿学博儒由于没有自己默默奉献而无闻，自然成为一个黯然无光的过客，被深深湮灭在风干的青史之中。

刘之益一生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、笔耕不辍，纸上留痕。他和文珂、夏道硕纂修的《涪州志》成为涪州、武隆文化史上一件流泽深远的大事，完全成了他的生命工程。为后来人了解本土历史，增加历史素养，培养爱国爱乡的情感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。后来董维祺主持续修的《康熙重庆府涪州志》这部志书流传到日本，成为目前世界上稀有地方志书之一，仅发现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，如今成为唯一珍藏的版本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刘之益于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年）四月十二日那个黯淡的下午走完了最后人生路，享年八十四岁，离开我们已三百三十年，离他开始“抄录”、纂修《涪州志》已三百六十多年。

在三百多年后一个春天，我依靠《涪州志》《刘氏宗谱》留下的蛛丝马迹，去凭吊之益先生，先去了涪陵钱家湾，后又去凤来镇高楼村，都不见坟墓，只见辽阔、开旷，一片亘古寂静。

究竟哪里才是真正的之益老先生埋骨之处？《涪州志·垄墓》载，涪陵长里钱家湾；《刘氏宗谱》记，初葬钱家湾，后与两代四棺一起迁回凤来高楼。

其实，几百年后的今天，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。唯每天清晨，太阳从天边喷薄而出，晨露欲滴，朝霞璀璨，天地一片澄澈。

唯有刘之益等人留下的《涪州志》，斑驳泛黄的纸页上，留下的历史痕迹，犹如春风玉露，到今天仍滋润着后人。